

## ■ 第一部分

# 历史和生活的命运



## 一、亚塞诺瓦茨—悲剧和歪曲

上天饶恕他，也饶恕我们众人！也有犯罪的人飞黄腾达，也有正直的人负冤含屈；  
十恶不赦的也许逍遥法外，一时失足的反而铁案难逃。<sup>①</sup>

——莎士比亚

### 1. 历史没有偶然

一个人所共知的古老见解是历史没有偶然 并且实质上几乎没有什么新的。

从一开始起，哲学思想就得出了两个根本性结论。甚至看上去是纯粹偶然的事情也是受比较深刻的原由制约的，并且是由看不见的线把它与历史存在联系在一起。这也适用于最深

<sup>①</sup> 参看《莎士比亚全集》第 1 集《一报还一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00 页。——译者（凡未加 ——译者”字样者 均为作者原注）

刻意上的经验：自从人注意到并考虑到历史起，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考虑到自己的未来，也就是说，考虑到历史会如何评价他。

这些想法，就像所有的想法一样，都可以作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解释。这样的解释要求理智地思考人的历史存在以及作为人类共同体的社会组成部分的民族的历史存在。这种思考应当带来对相互矛盾的自我利益或者民族利益的更好的理解以及这两种利益的和谐共存，并且带来更有可能而又从未充分做到的世界的普遍性。这样的解释是同与之相对立的一切相冲突的。

在这一水平上的历史洞察力，可以用作研究南斯拉夫多民族共同体当代历史的出发点。我愿把对我自身经验的思考带进这种研究，这种思考可能属于不同性质的文字工作。我相信，这种思考可能有助于增进对亚塞诺瓦茨问题和整个当代南斯拉夫历史的争论的了解。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得出结论认为，历史上存在永恒战争，就如在狼群中那样，这不光是由于物质利益相互冲突，还由于存在非理性的冲动。他还声称，“确切地说，不存在历史，只有传记”因为一定时期、运动或者民族的一切意识形态事件和真实的历史事件全是经由人民反映出来的。

## 2. 关于克罗地亚的“种族灭绝性”理论

从 80 年代初起，在铁托离开历史舞台之后，随着总的社会政治、经济、民族间和道德的危机的加剧，对于一些有争议的、混乱的和“微妙的”历史问题作出解释变得更为迫切。这首先发生

在文学和新闻领域，但是也发生在范围比较窄的历史编纂学领域。透彻地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重新估价的趋势变得比较流行。在对当代历史的一些有份量和有争议的问题作这样的解释时，对有关亚塞诺瓦茨集中营遇难者的历史事实的歪曲给予了特殊的关注。此外，有人试图证明作这样的歪曲是有根据的，把种族灭绝的倾向归之于克罗地亚属性的一切表现。

亚塞诺瓦茨死亡营是一个可怕的悲剧。纳粹分子和与他们勾结的人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人民。但是在这些可怕的事件发生后的将近半个世纪内，历史记录一直被故意改变，以达到政治目的。在亚塞诺瓦茨被杀害的非犹太人的数量被大大夸大，以图制造出反对克罗地亚人民的历史犯罪感。

第一，必须指出的是，许多克罗地亚人并没有同纳粹分子勾结，克罗地亚伪政府参与了对无辜人民的杀戮，但不能由于这种恐怖而怪罪整个克罗地亚人民，诚如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政府与第三帝国相勾结，不能怪罪它们的人民一样。对亚塞诺瓦茨死亡营和战时其他暴行的责怪不应当算在整个克罗地亚人民头上，而只应算在那些与纳粹分子勾结的人头上。然而，克罗地亚人民的敌人认为指责克罗地亚人民犯有滔天大罪在政治上是有效的。这样的指责既不正确，又是不该作出的。

对亚塞诺瓦茨集中营死亡人数的歪曲不光是不能确切和抱有政治动机，而且从道义上也是令人反感的。在我对历史资料的研究中，你们会注意到，只有非犹太人遇难者的数量被夸大了。这是对犹太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遭遇的独一无二和没有先例的悲剧的无耻贬低。纳粹政权单独挑出犹太人民加以摧毁。虽然战争使许多人遇难，但是没有别的国家的人民蒙受像犹太人那样的苦难。任何歪曲有关战争遇难者的历史记录的做法，不仅有害于对所有死者的纪念，而且有可能使犹太人民蒙受

的独一无二的悲剧变得模糊不清。对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歪曲是对克罗地亚人民的诽谤。这也是对犹太人民的亵渎。

几十年前，在对当代国家历史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作通盘评估时，我曾表示反对从政治上篡改有关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历史记录，这种篡改表现为对法西斯分子和乌斯塔沙分子恐怖受害者本来已经令人痛心的人数作出前所未闻的夸大。为此，我发现我自己在一个长时期内处于不那么明智的不幸的辩论的中心，处于南斯拉夫社会不同集团间相互争斗 甚至是相互报复的中心。

这决不是偶然的。作为一个学者和政治家，作为一个有思想、重行动的人 我一生在历史和历史编纂学方面都直接与克罗地亚在君主制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新近历史中的问题、困难和混乱有关。我经历了严峻的〔德国〕占领时期、克罗地亚独立国时期和革命。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跟全世界许多年轻人一样抱有幻想，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为找到解决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差异的理想办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开始对历史的演进有了比较理性的理解，这既是由于对历史的奥秘有了比较深刻的思考，也由于我自身的经历。

由于对历史的奥秘的这种思考以及由于我对自身经历的反思，我改变了先前有过的某些想法，对某些问题变得比较敏感。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的一名政治犯。自那时以来，我目睹了这个国家的解体和一些独立国家的出现 包括我自己的克罗地亚在内。这一过程是艰难的 不幸的是 还是流血的。在这一过程中 我更加了解了可怕的历史悲剧。不光是更了解了我自己人民的历史，而且也更了解了其他许多种族和民族所遭遇的悲剧。

当克罗地亚人民处于铁托的独裁统治和塞尔维亚人占主导

地位的南斯拉夫的桎梏之中时，我首要关心的是保护克罗地亚的民族和文化，特别是保护它们不受克罗地亚的敌人的无原则攻击。有时候，我的爱国主义变得很强烈。我由于集中注意我自己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没有足够地注意到其他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我的一些学术著作，努力阐明了针对克罗地亚人民的罪行的真相，从而使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我试图否认或者掩饰乌斯塔沙政府犯下的罪行。另一些人觉得，我对战争罪行的学术性调查贬低了亚塞诺瓦茨和其他地方的战争受害者的回忆，或者使这种回忆变得平淡。

我现在认识到，我为纠正历史记录作了努力，我这样做可能使那些遭受过不幸的人，他们的家庭、朋友、同胞和教友感到痛苦。在历史调查中，无论是引用统计材料或人口材料，很容易把这些材料仅仅看成是数字，而不是一条条人命。当然，在我的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从未忘记这样一个事实：那些战争遇害者是遭受折磨、可怕地死去的一条条人命。在战争中，我自己失去了父亲、弟弟和继母，我始终怀念他们。我从来不想通过我的学术活动来贬低任何战争遇害者的经历。

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犹太居民的遭遇值得格外注意。犹太人民在整个历史上苦难重重，但是在本世纪的遭遇最悲惨。本书后面我将描述在这些岁月中许多野蛮的政治的、宗教的和民族的暴行 其中 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是全部历史上曾经尝试过的最具破坏性的种族灭绝行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全世界

“乌斯塔沙”原为“起义者”之意，是宣扬极端沙文主义的反动民族主义运动，二战时投靠德意法西斯，与南共领导的人民武装为敌并在德国支持下成立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曾杀害大批塞尔维亚人。——译者

闻所未闻的最严重的罪行。这不只是一种愚蠢的野蛮行径，而是由一个机械化的官僚机构实行的一种总体种族灭绝的蓄意和有组织的战略。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种族被一个国家列为彻底摧毁的目标。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并为此而祈祷和战斗。

在我的所有调查中 我想的是澄清历史记录 以便使不同的解释 即便不能彼此调和 也至少能够加以说明并被人理解。对历史事件解释的差异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这也不是任何特定时期或者特定地方所特有的。欧洲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米利都的 赫卡泰奥斯 公元前 6 世纪 说过 他只是详细描述了他认为是真实的事情 而希腊人的口头传说又矛盾重重 显得可笑。甚至堂吉诃德向风车发动攻击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战时的冒险行动容易使人对事实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因为堂吉诃德可以指示桑丘<sup>①</sup>，说“一切取决于我们的意愿”。）阿瑟·叔本华（1788—1860）有充分的理由声称“，历史女神克利奥 完全彻底地感染上了谎言 就如街头的妓女感染上了梅毒一样”。历史上没有多少参与者有能力作出客观的研究和不偏不倚的判断。历史学家们得出的结论的差异——且不说这些差异有其民族根源——都取决于他们从哲学角度对历史理解的差异。这甚至在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也有反映。因此“，蒙森 对一个时期

- ①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的仆人。——译者
- ② 克利奥是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娄巴特拉的昵称。——译者
- ③ 特奥多尔·蒙森（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 著有《罗马史》、《拉丁铭文集成》、《罗马国家法》等 获 1902 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

的看法不同于吉本<sup>①</sup> 丹纳 在米什莱 为之欢呼的政治事件面前吓得胆战心惊”。<sup>④</sup>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们告诫说，“不要相信每个时代对自己自吹自擂的东西”。自然，这也必定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们。

作上述简要的回顾是必要的，这是为了表明，在对南斯拉夫当代史的理解上出现分歧和对立意见并不是不正常的。甚至当我们考虑到，在持有相同世界观的人中间这种分歧和对立意见常常极其激烈时，这也不令人感到意外。例如，甚至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民族性质的利益常常压倒一切形式的超民族目标。

### 3. 对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歪曲 在反对克罗地亚上起了主要作用

我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就认识到，在亚塞诺瓦茨问题上的争论对于以当代精神来理解克罗地亚人民的近代史是至关

- ① 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6卷 记述从 2 世纪起到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为止的历史。——译者
- ② 伊波利特·阿道夫·丹纳(1828—1893)，法国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实证主义哲学家 著有《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等。——译者
- ③ 朱尔·米什莱(1798—1874) 法国历史学家 著有《法国史》、《法国革命史》等。——译者
- ④ 西德尼·胡克：《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波士顿 1965 年版第 56 页。

重要的，自那时以来，我一直鼓励人们对这个问题开展历史研究。<sup>①</sup>我也开展了我自己的研究，并且写了我自己的回忆录。<sup>②</sup>在这些著作中我论证说关于战争遇难者的故事特别是关于在亚塞诺瓦茨遇难的人的故事，被人有条不紊地利用来制造一种被歪曲了的历史意识许多善良的公众活动分子甚至历史学家都陷于其中，或者出于他们自身的机会主义原因而自愿地接受这种意识。

自从我最初着手研究以来，我所提出的关于夸大亚塞诺瓦

- ① 在我所起草并于 1961 年 12 月 25 日被委员会通过的《工人运动史研究所活动参考大纲》中，除了有一篇单篇论文述及克罗地亚共产党历史、人民解放斗争、革命、乌斯塔沙运动和克罗地亚立国之外，还预告了对占领者、乌斯塔沙分子和切特尼克分子的恐怖和罪行的研究。见《革命之路》，萨格勒布 1963 年版第 519—536 页（“切特尼克”原为“参加队伍的人”之意，最初出现于 19 世纪后半叶，系塞尔维亚非正规志愿武装人员，为摆脱土耳其奴役而斗争，后为南王室所利用，变成了反动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反对南共领导的游击队，其首领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南斯拉夫解体后，“切特尼克”分子及其支持者又重新活跃在南斯拉夫政坛。——译者）
- ② 参看我的著作：《占领和革命》（萨格勒布 1963 年版）；《关于对君主制南斯拉夫垮台的原因以及人民解放斗争在克罗地亚发展的前提的探讨》，1964 年；《关于克罗地亚革命民主运动发展的一般条件和特点》，1966 年；《从百科全书的角度探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历史》，1967 年；《关于斯拉夫民族相互关系的思想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1968 年。所有这些作品都收录在《伟大的思想和小国人民》一书中，1969 年（1970 年出第二版）；在《当代欧洲的民族主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一书中直接探讨了战争遇难者的问题；特别是（对指控的回答）以及手稿（可憎的历史）中对国家高级机构和政治机构以及公众人士的复信（自 1981 年至 1986 年）。

茨集中营战争遇难者人数的论点已为其他学者所确证。科恩博士在他的《塞尔维亚的秘密战争》一书中不仅确证了我对于在这个集中营死去的人数的估计，而且还同意，认为捏造人数是蓄意所为，是有其政治动机的。<sup>①</sup>

科恩博士写道：

“贝尔格莱德政府从一开始就知道，最初声称的有 170 万战争遇难者是假的。然而，鉴于夸大了的数字有利于南斯拉夫抢先对德国提出战争赔偿，于是这个虚假的说法就延续下来了。1964 年，不包括外国人和通敌分子的人口统计数字显示了三分之一原先声称的战争遇难者仍然活着，由此而产生的数字就成了国家机密，一直保存到写本书的时候（1996 年）。对于许多塞尔维亚人来说，夸大了的战争损失，特别是所谓在克罗地亚亚塞诺瓦茨集中营死亡 70 万至 80 万人，仍然是围绕塞尔维亚战争记录的神话的一部分。然而，继续伪造这种损失不再能使人不加批判地接受。”<sup>②</sup>

然而，回顾一下我当年提出自己的看法时，我并没有得到这样的支持。我的想法是与保持一个大塞尔维亚的主张尖锐地对立的，我的想法是与政治实用主义的观点不相容的，因此，我发现我处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当时，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革命

① 菲利普·科恩：《塞尔维亚的秘密战争 宣传与对历史的欺骗》得克萨斯 A&M 出版社 1996 年版。

② 同上书，第 111—112 页。

和当代国家史，总的来说，不仅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也受直接的政治影响。由于坚持原则，认为任何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利益都不能用来为那种对国家历史采取非学者的态度辩解，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处于各种政治游戏的漩涡之中，成了政治流放的目标，后来又成了司法迫害的目标。这首先发生在 1967 年反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中心”的“让科进军”期间，由于有人写了《克罗地亚文学语言的名称和地位宣言》而被指责为“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后来又发生在 1971 年对克罗地亚“群众运动反革命”的镇压期间，最后发生在 1981 年“铁托死后的”第一次政治公审期间。

#### 4. 反对歪曲亚塞诺瓦茨集中营情况 被用作进行迫害的口实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没有人想通过严肃的批判分析的手段来反驳我的学术观点，或者驳斥我对于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的解释。对于我所写的所有的文章和书都绝对保持沉默，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我在阐述对亚塞诺瓦茨集中营情况的歪曲其中的一个论点，成了发起一场迫害运动，包括几年来所有的日报和期刊对我进行的人身攻击的口实。由于我反对夸大亚塞诺瓦茨遇难者的人数，各种可怕的罪行都加到我的头上——这是斯大林式惩罚武库中众所周知的一种手腕。我不仅被指控犯有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还被指控与流亡在外的法西斯分子和恐怖主义的

乌斯塔沙分子以及外国情报中心相勾结。①有些攻击我的人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我，他们所使用的提法是“历史的篡改者”、“法西斯分子”以及“种族灭绝的疯人思想”的代理人。波斯尼亚的某位“H. M. 教授”称我为霍梅尼的追随者，声称我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的《伊斯兰宣言》的起草者。②

我蒙受一场迫害运动之害。幸运的是，结局并不像那些在

- ① 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那些一起报复我的人的深谋远虑：他们把 1972 年一个乌斯塔沙恐怖主义集团被消灭的系列报道用作指控我是历史的篡改者和与乌斯塔沙分子勾结的借口，在这批系列消息中，除了我（被经常提到外），列在名单上的还有米·吉拉斯以及“克罗地亚之春”的领导人米·特里帕洛和萨·达布切维奇—库查尔。这批报道首先出现在贝尔格莱德（政治快报）上题为《如何扼杀自由》分 29 次连载（从 1979 年 8 月 13 日至 9 月 10 日），后来登在斯普利特的《达尔马提亚周报》上（从 1979 年 10 月 21 日至 12 月 23 日第 441—450 期）题为《拉杜萨行动》副题为《一切都相关联》和《与间谍中心相联系》米哈伊洛维奇在书中也发表了这批报道，并在别的报纸上，如贝尔格莱德的《记者报》1981 年 4 月 2 日至 9 日第 771 期上一再重申他的指责。（米洛凡·吉拉斯 [1912—1995] 南斯拉夫政论家、文学家，1935 至 1954 年间为南共中央委员，曾任南共政治局委员、联邦国民议会主席，1954 年南共斥其为修正主义分子，被免职，后曾两次被判刑。吉拉斯过去被误译为“德热拉斯”。他的代表作有《新阶级》、《与铁托谈话》、《铁托内幕故事》以上三书均有中文版。另写有《没有正义的土地》、《不完全的社会》、《生命的片段》等书。米卡·特里帕洛 [1926—1996] 曾任南青年团书记、南共中央委员，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书记；1971 年与当时任克罗地亚总理的萨夫卡·达布切维奇—库查尔、萨格勒布市长皮尔凯尔一起被撤职。——译者）
- ② 令人感兴趣的是，他是在一篇对于“受宪法牵制的”人的合乎情理的评论中说这番话的。（萨拉热窝（世界报），1985 年第 1393 期）

一个斯大林主义国度里失宠的人经常遭遇的那样——从肉体上被消灭。我仍被允许活着，尽管像杜尚·德拉戈萨瓦茨博士和马林科·格鲁伊奇这样的官员“从理论上”阐释说“我已堕落为反革命分子，应予打倒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sup>①</sup>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场疯狂的迫害大为缓和，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相反，这种迫害十之八九决不会消失，而是采取新的和更为深沉的做法。诚然，围绕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争论问题所具有的意义和严重程度，使得这些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从议事日程上消失，不论有多少人由于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而受到迫害。这些问题最终要求作出学术性的探讨。

近来，我们目睹有人对旧的提法重新加以研究，并且提出了新的看法，但是，不是客观地加以研究，而是站在有偏见的立场上作出判断。

1986年重新出版了维克托·诺瓦克写于1948年的书《滔天大罪》。这本书从学术角度来看纯粹是不合时代精神的，它把克罗地亚的自治归结为“教权主义”或者归结为臭名昭著的“教权

① 这促使我给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杜尚·德拉戈萨瓦茨博士和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克罗地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代表会议主席团委员马林科·格鲁伊奇（于1981年7月30日）写了一封公开信。我还把这封信（共9页）分别寄给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克罗地亚共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联邦和共和国的社会主义联盟，以及寄给《战争报》、《信使报》和《政治报》的编辑部。对于它们是否发表这封信，我根本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我坚信，将来某个时候，这封信终究是会发表的。6年以后，1987年6月，在我逗留加拿大期间，我意外地收到了身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位不认识的同胞的来信，他把我给德拉戈萨瓦茨和格鲁伊奇的信译成英文，复印了7000份，分发给美国的一些著名人士。

民族主义”和“教权法西斯主义”)因而特别惹人注目。这本书的重新出版意味着反对与狭隘的南斯拉夫统一观念不一致的任何形式的克罗地亚属性的势力又恢复了。其他的例子还有韦利米尔·特尔齐奇。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南斯拉夫王国的垮台》等),把南斯拉夫王国的垮台完全归咎于克罗地亚民族,并把他的这种指责同亚塞诺瓦茨联系在一起。特尔齐奇是一位中将,军事历史研究所的前所长。据他认为,在亚塞诺瓦茨集中营“至少有 100 万塞尔维亚人被害”。<sup>①</sup>另一个例子是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所写的《铁托传补遗》,他倾向于消除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铁托的神话化,特别热衷于谈论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遇难者。<sup>③</sup>

韦塞林·久雷蒂奇的学术思考沿着同样的思路。他提出了如下一些论点 诸如极度轻视“塞尔维亚人的悲剧”这是毫无根据的“犯罪人人有份”尽量贬低驳斥共产国际关于“塞尔维亚帝国主义霸权的假设”的必要性,以及在考虑切特尼克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方针时需要考虑“生存动机”。同时,他并没有以同样冷漠的态度来考虑南斯拉夫冲突的其他参与者方面存在

- ① 参看与《南斯拉夫王国的垮台,1941 年》一书作者退休中将军·德尔齐奇的谈话,载于贝尔格莱德《采访记》杂志 1983 年 8 月 5 日第 57 期第 4—9 页。
- ② 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1910—1994),南斯拉夫著名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法学家。曾任南共中央宣传部长、南通社社长,1953 年因同情吉拉斯被开除出党。他撰写的《铁托传》、《苏南冲突经历》和与人合著的《南斯拉夫史》已有中文版。——译者
- ③ 参看德迪耶尔对一些富有宣传色彩的统计资料的歪曲、他在“罗素法庭”的活动,以及他通过指责梵蒂冈试图强化关于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神话。

类似动机的可能性。<sup>①</sup>

## 5. 夸大克罗地亚民族的历史罪行

前面提到的这些人和人数日益增加的其他一些人对于克罗地亚民族的历史罪行提出了许多说法。他们指控带有克罗地亚属性的一切民众运动和著名的历史人物，从约西普·施特罗斯迈尔<sup>②</sup>的南斯拉夫主义和斯捷潘·拉迪奇的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邦联主义，一直到铁托的根据“阿弗诺伊”<sup>④</sup>的平等的基础。他们所反映的如果不是一种绝望的状态至少也是深刻的历史理解危机。这场危机最清楚地表现在围绕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争论

- ① 参看韦塞林·久雷蒂奇：《盟国和南斯拉夫战时的戏剧性事件》，贝尔格莱德 1985年版第1卷第72—90、111—150页，第2卷第239—253页。
- ② 约西普·尤拉伊·施特罗斯迈尔（1815—1905），克罗地亚主教和政治家，1860年至1873年曾任人民党领袖。他主张南部斯拉夫各民族在奥匈帝国范围内实现统一，主张斯拉夫各民族宗教上统一，在他大力资助下，1867年建立了南斯拉夫科学艺术院，1874年建立了萨格勒布大学，他还曾反对教皇永无谬误的说法，在当时的巴尔干地区是一位有影响的进步人士。——译者
- ③ 斯捷潘·拉迪奇（1871—1928），克罗地亚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曾反对奥匈帝国统治，是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主张变南斯拉夫王国为邦联，1928年在议会遭接近南王室的塞尔维亚议员普·拉契奇枪击受伤身亡。——译者
- ④ “阿弗诺伊”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二战期间在解放区建立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简称的音译。1943年11月29日“阿弗诺伊”在解放区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为1945年11月29日成立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前身。——译者

以及华西里·克雷斯蒂奇教授关于《克罗地亚独立国对塞尔维亚人实施种族灭绝的起源》的理论<sup>①</sup>。同时，不断有人致力于从理论上、甚至从学术上来支持对亚塞诺瓦茨集中营情况的夸大，尽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情况刚好相反，这造成了一种气氛，使人既无法又不允许理智地来讨论这场争论。

就亚塞诺瓦茨集中营设立了研究项目，专家们展开了讨论，甚至组织了国际性学术会议。在这些论坛上，发言的人一再重申关于‘至少有 70 万人’被处决的‘权威性的’真相。而在场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不敢公开地反对各种人士对事实的摆弄和错误的解释，只指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调查。以真理的名义提出这样的意见，他们的良知得到了慰藉。但是，更有偏见的调查得出的只是遇难者的人数更多，而不是对历史真相的确切记录。

1986 年，一部早就预告、人们期盼已久的史学著作问世了，它最终确定了有关亚塞诺瓦茨的有争议的事实。这部书分两卷，总共有 1124 页，是由军事历史学家安东·米莱蒂奇博士上校撰写的，包含了众多的文件。耶夫托·萨维奇中将写了前言，作者自己在序言中概述了他研究的结果。<sup>②</sup> 这部书将成为在这个极其严肃的问题上存在的混乱的最有力的确证。<sup>③</sup> 就所收集的材料而言，这部书无疑是对研究这些问题的最全面的贡献，尽管它包含的文件来自不同的来源，对文件的可靠性不作任何批判性

- ① 见《文学报》1986 年 9 月 1 日第 716 期第 4—5 页。
- ② 参看安东·米莱蒂奇：《亚塞诺瓦茨集中营（1941—1945）文件》2 卷集，贝尔格莱德人民书籍出版社 1986 年和 1987 年版。
- ③ 参看日报和周报上的书评；《我们的题目》杂志就这部书组织的一次会议的与会者的评论，1986 年第 9 期第 1265—1320 页；《历史历史评论》杂志对这部书的评论，1986 年第 1 至第 4 期合刊第 234—241 页。